

Wh 文化聚焦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创造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也带给中国文学丰富的中国故事和取之不竭的创作矿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立足本土,认识中国和表达中国?2015年11月10日—12日,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博鳌三江入海处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的作家、诗人、评论家近60人,各抒己见,在此交流与碰撞,在南海之滨发出中国文学的声音。



铁凝

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海南研讨:

世界视野里的中国文学

■ 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徐晗溪

中国文学,在博鳌发声。它指向未来的意义,必定不凡。

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是此次论坛探讨的主题,它不仅深具理论性,也是活生生的创作问题,视野开阔,引来作家、评论家的热烈探讨。11月10日,中国作协副主席铁凝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必须思考,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之于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塑造自己,也关系到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文学。”

立足本土 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现状表达了他的忧虑。“我记得我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批评现在的作家、批评家一谈文学就是谈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一谈理论就是谈汉娜·阿伦特,你跟他们有仇吗?这些作家、评论家都非常好,我只是想强调,面对我们中国当下如此复杂、如此具体的经验,中国的作家、批评家能不能直面这个经验本身,在这个经验的具体性与特殊性上去有所发现,而不是简单的拿来,用拿来简单的来处理我们的经验。”

这次论坛的参加者既有作家,又有文学评论家、出版家、媒体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说,如此规格的论坛尚属首次,希望能够为作家和评论家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场合,通过深度的沟通,让文学批评引导文学创造。而中国文学如何从如此复杂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中国经验中,获得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是这次论坛主要的焦点所在。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是一名活跃的文艺批评家。他说,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一直有一种焦虑,担心失去讲述自己经验和生活的逻辑和能力。而事实上,中国文学是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讲述方式的,这从古代诗词中的时空表达、中国文学和绘画对山水的崇拜等,都可以窥见。我们的语言已由文言文变成白话文,这使文学在逻辑上跟传统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因此从传统资源中重新找回、接续这种传统,再与新的时代条件融合共生,是时代向文学家们提出的重要课题,关于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与中国的经验,批评家孟繁华说,中国经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是现在的,不是过去的,历史的。

在分组讨论上,评论家刘复生的诘问引人深思:为什么中国作家整天在书写中国生活,却不是中国经验?问题出在哪里?刘复生说,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经验”开始成为问题,表明了中国文学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认知,这种提问包含着一种创造伟大的中国文学的历

史冲动,当然,这样问的时候,也表明,中国作家和理论界的深深的焦虑,大家似乎并没有找到走向真正的中国经验的路经和方向。

批评家张莉回应说,中国视野不只是中国立场,还是如何全面地、纵深地、设身处地地理解中国及其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不能把自己从这片土地上抽身而出,不能把这里的文化和现在只作为“审美对象”,只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把“他们”只视为“他们”,而要用切肤者和在场者的经验去认识。

立足本土,讲述中国故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家的困惑也是时代的困惑

中国文学博鳌论坛,是一个文学评论的论坛、一个文学批评的论坛,而这种评论和批评是结合文学创作来进行的。批评家、作家们在论坛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试图寻求一种理论上的理解,双方“围炉夜话”,坦诚相见,一方面增强了理论批评的现场性、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开阔了作家的视野、激发创作灵感。

作为一位1950年代出生、成名于新时期的作家,杨争光关于认知与表达的困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感知中国,表达中国,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自觉,也是责任和权利。就说百年来的中国吧,同样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悲惨世界》不就是从贫穷起笔的?同样经历过战争,《静静的顿河》不就写战争吗?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是自身的认知能力天生不足?是理性的故意缺席?这是我的困惑。”杨争光真诚地表达着,充满着个人经验,令人深思。

“70后”的代表性作家鲁敏的观点给大家带来新鲜的气息。这些年,在与外国版权机构或一些代理人接触的过程中,鲁敏碰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一种类似“主题订制”般的沟通诉求。有一家意大利的出版人如此约稿:我们需要“非虚构的、真实发生的”的故事,并且“故事性强一些”那就更好了……对此,他们有进一步的解释,一是因为早

些年所输出的中国小说,要么是古典的《红楼梦》与《水浒传》,要么是建国初期的乡土小说,以及稍后的家族小说、历史题材小说,他们认为,当下的外国读者不再感兴趣了,他们对传统乡村叙事的认同感较低,他们更想看“现代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此,鲁敏说,老实讲,我不大赞同他们的这种眼光和分析,城里或乡下、古老或现代、虚构或非虚构,压根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以此来判断是否翻译或引进某部作品,失之简单粗暴了,甚至违背了文学之本意。但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要理解和接纳这一莫名其妙的局面,“在目前的国际版权交流中,中国显然还处于卖方位置,对大部分欧美买手来说,他们的眼光有点新闻传播式的,而对于更深层次的、更高一级的文本分析、审美创新以及文学价值方面的判断也许还要等待好长一段时间。”鲁敏道出了一个事实,引发人更多的思索。

当面对“文学如何回应和激活传统资源”这样深奥的问题时,作家祝勇认为,可以采取一个简单的步骤,就是回到最基本、最朴素的问题上,以退为进,就像我们在迷路的时候,回到起点往往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我写《故宫的风花雪月》,写王羲之、张择端、唐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们在历史中的所有奋斗与挣扎,都是围绕自己的内心展开的。体会到他们的内心,才能够理解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我写作中努力恢复他们生存的真实感。历史不可能复现,我们也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景象,但历史可以靠近,近到我们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中国文学也需要“海南经验”

听了来自各地专家的发言,《天涯》杂志编辑部主任林森也分享了他的“中国经验”,“对我来说,中国经验其实也就是海南经验”。原来一位曾经编辑过他小说的编辑曾对他说,“在他的小说中闻到海风的咸味”,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小说中书写海洋,但语言中的感觉仍然把海

洋的味道传达了出去。

针对“海南经验”,有专家指出,四面环海的海南岛,对海洋的耕耘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并没有为农耕文明强大的中国文学注入异样的“海洋表达”,而这,无疑也是海南文学的机会——缺少了“海洋表达”的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

为期三天的论坛信息量密集,思想交锋不断。作为本次论坛的协办单位,海南省作协和《天涯》杂志全力以赴,办好论坛开篇第一章。刚刚纪念改版20年的《天涯》,不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们谈论的话题,《天涯》无疑是“中国经验”“海南经验”的重要载体。与会嘉宾南帆、何向阳、孟繁华、周晓枫、谢有顺、邵燕君、东西、张楚、阿乙等等,他们都是《天涯》杂志的作者,与海南有着不浅的缘分。评论家谢有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南本是一个岛,岛屿的生态环境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生态,而海南岛又是开放的,始终吸引并包容着外来文化。因此,海南形成了两股特别的作家群,一种是外来者,而后扎根海南的外来者,比如韩少功、蒋子丹;一种是海南本土作家,如孔见、惠蕙。这两股力量就构成一种对话,使得海南不再是那么孤立的思维。

与会者的共识是,海南文学的创作题材非常丰富,涵盖古今,既有本土原生题材,比如海岛民俗、原住民、南洋文化资源以及古老的神话故事;又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冒险”故事,比如,下海、奋斗、创业,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个人遭遇。这是海南创作的其中两种主要资源,也是“海南经验”乃至“中国经验”创作的源泉。随着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的落户,海南文学必将迎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海南故事。



欧阳江河



东西



张莉



孔见



邵燕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

构建平凡温情的桃花源

的日子;而张楚本人生活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过着朝九晚五的平凡生活。

小学四年级时,张楚来到这个县城,多年过去,这个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变化。他看着街边的各种小店,有理发的、开川菜馆的、开一元店的、开门诊的、售熟食的……

这些白日里的影像,是张楚的夜间创作源泉。

作为一名多年生活在基层的写作者,张楚声称自己因时常沉溺于生活本身,“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的他,这样介绍自己,似乎始终记着白日里的张小伟,他认为,“最重要的创作源泉其实就

是身边这些最普通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在张楚看来,这个他们也是张小伟们,所以他知道这些他们蕴藏着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

对张楚而言,身边这些有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男人或女人,在他们身上显露或隐藏的事情,以及这些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缘由,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才是有个性的、独立的,甚至是永恒的故事。

70后作家夹缝中求生存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学爱好者们的张小伟之所以为著名作家张楚的原因。

张小伟带给他绵密、敏感、抒情而又内敛的叙事风格,他笔下的故事始终在残酷与柔情中曲折推进,但在纷繁复杂中,每一次都能发现至善的力量。这种平凡之中的脉脉温情,便是那个作家的张楚想要构建的桃花源。

当下社会,纯文学期刊被网络压制,穿越小说、盗墓小说、官场艳情小说,大行其道,纯文学成了小众文学,只是针对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因此,70后作家的地位颇为尴尬,他们既不像60后,比如余华、苏童,很早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又不像80后,比如韩寒、郭敬明,直走走进市场。

70后作家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一

代人,如何在纯文学式微的大背景下满怀信心地构建自己的城邦和王国,固守自己的疆土;如何在西方价值理念为主导的现代性浪潮中,把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讲好;如何在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同时,保持自己文本和语言的个性、特色和人文情怀,拷问着张楚以及像张楚这样的写作者。

“我想,只有立足和深入现实的问题意识,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才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立足本土、深刻表达中国的要素”,这是张楚给出的回答。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创造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也带给中国文学丰富的中国故事和取之不竭的创作矿藏,对于处在跃升期的张楚来说,他以不懈的写作悄然进行风格转变。这种转向既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变法”,也是他对自身写作惯性的主动挑战。张楚用自己的变化,证明着变化的自己。

这不仅对自己变化的存照,更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记录。

沉溺于生活本身

“我的生活是我的本名,而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笔名”,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楚这样定义自己的双重身份。张楚的小说多以冀东平原上一个普通小镇为布景,人物平凡无奇,过着庸常琐碎

铁凝:

差点错过骑楼老街

本报讯 (记者蔡葩 陈蔚林)11月11日中午,前来参加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铁凝,在海南省文联主席张萍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对完全迥异于北方的南洋骑楼赞不绝口。

这是铁凝第二次到海南,“记得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随团来海南,直奔三亚,对海口没有留下印象。今天来到海口,没有想到海口有这么好的老街,建筑这么漂亮!”铁凝一踏上中山路步行街,就禁不住赞叹,她边走边称:差一点错过骑楼老街!

正是雨过天晴,海口中山路上阳光和煦,空气里有一种海岛特有的温润气息。漫步在白色外墙的骑楼,看骑楼群的天际线在明朗的天空下越发美丽,女儿墙有中式马头墙造型,也有欧洲金字造型和巴洛克造型,甚至伊斯兰的尖顶造型,是典型“西式造型,中式纹样”之混搭,铁凝一再赞叹:“老街的建筑这么有特色,真漂亮!”她不时做深呼吸状,说:“来海南就要深呼吸!”

当她来到中山路35号海口骑楼文化展示中心,得知著名的人文杂志《天涯》常在这里举行一些文学沙龙,新海岸艺术沙龙也常聚集着艺术家们探讨创作并进行展览、相互交流,铁凝对老街生发的文化现象给予鼓励和赞赏。她认为,海南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骑楼老街是南洋文化的载体,海南作家挖掘本土文化大有可为。参观结束后,铁凝表示,随着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定址海南,她会更加关注海南文化,会常来骑楼老街看看。

邵燕君

评说《琅琊榜》:悄然发生的性别革命

■ 见习记者 尤梦瑜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琅琊榜》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促进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而在于显示一种二次元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路径——这是一场“腐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的“总攻”,背后是一场静悄悄发生的性别革命。”

参加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接受本报专访时从性别文化与角度,解读剖析了电视剧《琅琊榜》火爆背后的文化因素。

红遍全国的《琅琊榜》因其网络文学的出身而再次引人关注。作为一篇十年前的老文,其迟滞效应的火爆足以给网络文学再添一笔重彩。它一夜爆红的原因与其代表的文化现象引人思考。

网络文学“腐文化”挺进主流文化

邵燕君解释到,这里的“主流文化”是指一种男权文化下的审美文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古装剧里的‘江山美人’,《琅琊榜》里,我们发现这一不言自明的性别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这里的‘江山’有女人的份儿了,大将军霓凰、悬镜司长史夏冬都是以自己的职业身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朝堂幕府的,完全是职业女性形象的自然投射。”而该剧受年轻一代追捧的重要原因——男演员“颜值高”,更是诠释了“美人”一词,甚至被戏称“颜值匹配者,方能以帅治国”。

而剧中男“美人”这一元素能被推崇至这部戏的瞩目焦点,在邵燕君看来主要是因为与网络文学同步兴起的“腐文化”的日益盛行。

20世纪90年代末,受日本耽美(幻想男男爱的故事)动漫、小说以及台湾耽美小说的影响,中国大陆的耽美创作群体逐渐孕育成型。

网络的出现,使女性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可以避开男性的目光,生发自己的欲望,幻想一种更理想的亲密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腐女”们只是自娱自乐,“伴随着十几年的发展与成长,‘腐女’文化在‘二次元’的‘女性向’空间暗自生长,终于在消费主义护佑下破壁而出,向‘主流文化’领地挺进,且老少通吃,全方位‘霸屏’。”邵燕君这样分析。

女性审美推动文化反哺

邵燕君谈到,在“腐女”的欲望目光中,一种来自中国古典传统的男性审美观再度开出花来。比起肌肉,“文”的力量造就了传统古典男子的魅力。正如在英剧《神探夏洛克》里,夏洛克的神机妙算被指认为一种新的性感。这些都在回应着当年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在网络信息时代,力量被数字化了,智与美结合成为一种以性感命名的新权力。所以,梅长苏的智谋也可以被颜值化——夹杂着“腹黑”的权谋以颜值为外挂,“美可敌国者”方可以“帅治国”。

中国电视屏幕上男神形象的转型还是显示了某种“大国崛起”的印记。邵燕君说:“受日韩文化滋养多年的中国ACG一代,该到文化反哺的时候了。据说,这次韩国对《琅琊榜》的引进节奏明快快于此前的《甄嬛传》,与中国大陆同步推出。”

不可否认,《琅琊榜》仍然是一部非常主流的电视剧,它的“主流性”正体现在它“以美治剧”,美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以美为器,无往不利,何况这个美以如此“萌”的方式与智力、技术结合,成为网络时代的新生感,以此负载传统文化,一定能在文化输出中成为一把锋利的软利器。



关注
文化
周刊
二维码